

海外视野

“哈佛保卫战”：从象牙塔蔓延到权力核心的文化战争

郭英剑

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撤销哈佛...

作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高校，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约占学生总数的1/4...

在我看来，该事件的轰动效应之大，堪称新世纪以来全球教育界最剧烈的一次震荡。

权力、知识与文化的碰撞

此次事件并非完全令人意外。它其实是2024年底哈佛遭遇美国国会严格审查事件的延续...

在我看来，该事件不仅是一场大学的公共灾难和一场观念之争，更是一场蔓延至权力核心...

过去几十年中，哈佛大学及其同类精英学府因其自由主义立场、社会正义话语和多元包容政策...

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哈佛“处理反犹是否得当”，还有“哈佛为何成为靶子”，以及“谁有权决定大学价值”...

为此，我将这次哈佛的抗争以及美国学界乃至全球高等教育界对其的声援称之为“哈佛保卫战”...

从意识形态对立到制度性重塑

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哈佛的极限施压，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了。

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已成为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争夺之地。2017年，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频繁对以哈佛为代表的常春藤盟校发起批评乃至政治性攻击...

其次，初期攻势是从话语建构开始到政策威胁(2017-2020)。特朗普频繁抨击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指责大学“扼杀言论自由”“压制保守派声音”...

再次，号召美国国会向哈佛进行制度审查。再度步入总统竞选期的特朗普以“反犹主义”“校园暴力”“招生不公”为由，重新炮轰哈佛...

我国大学缘何加快捐赠讲席建设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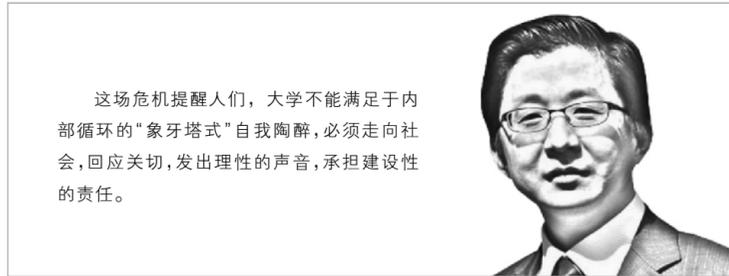
陈会民

捐赠讲席是大学利用社会捐赠建立的教授席位，起源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1502年设立的玛格丽特夫人神学讲席。

近年来，各大高校不断完善捐赠讲席制度规范，丰富讲席项目设计，推动捐赠讲席快速发展。2016年，清华大学提出5年内设立不少于100个讲席教授席位...

从顶尖名校到普通院校，从部属院校到地方院校，我国大学缘何加快捐赠讲席建设步伐？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五点原因。

第一，捐赠讲席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这场危机提醒人们，大学不能满足于内部循环的“象牙塔式”自我陶醉，必须走向社会，回应关切，发出理性的声音，承担建设性的责任。

策与制度进行审查的听证会。会上，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质问哈佛、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校在处理亲巴抗议与校园骚乱中的“不作为”...

最后，动用行政命令冻结哈佛的美国联邦政府拨款，剥夺其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7届总统后不久，美国教育部与财政部便启动了对哈佛的联邦拨款项目审查...

应该说，上述美国政府的行为反映了教育自主的结构性危机——大学自由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连续进攻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反映出一场结构性的政治重组正在加速进行。传统上，美国大学享有“制度性自主”，即在招生、教学、研究与价值引导上的独立空间...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随着“大学是否仍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的讨论越发激烈，大学的合法性正被置于持续的政治博弈中。从特朗普的“文化战”策略来看，大学不再只是一个教育机构，而是被建构为价值斗争中的敌对阵营...

哈佛的回应与高教联盟的集体反应

在此背景下，哈佛的财政危机不是孤例，而是象征性揭示了大学自由精神正面临“财政-政治-舆论”三重夹击的现实。

在特朗普政府采取审查与资金冻结手段之初，哈佛并未立刻作出强烈反应，而是采取了相对克制、审慎的态度，试图通过内部磋商与法律评估以缓解局势。

哈佛的转变是显著且有利的。今年3月，校方正式对美国财政部提起联邦诉讼，指控其以政治动机干预学术机构的财政与治理。这标志着哈佛从单一学校利

益的防守，转向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争取制度正义与公共信任的主动出击。更关键的是，这场诉讼并非不是象征性抵抗，而是明确聚焦于政府通过财政杠杆手段控制大学意识形态与办学自主的危险趋势。

哈佛的起诉很快引发全美高教界的广泛声援，很多高校公开谴责美国联邦政府。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危机中的“联合意识”开始显现。过去数年，由于在很多议题上的分歧，美国高校之间并不总能保持一致的价值立场。但此次哈佛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面镜子，反映出美国整个高教系统普遍存在的脆弱性——当一所标杆性大学都无法免于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操控时，其他大学的制度安全亦岌岌可危。因此，这种“制度自保机制”不仅是同声援助的情感共鸣，更是在现实逻辑推动下的理性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场联合反击彰显出大学在面对权力干预时的一种“后危机反思机制”。不少高校在支持哈佛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内部治理结构与舆情管理机制，试图在保持大学开放性与自由性的同时，强化公共沟通，完善危机应对。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大学的信任，也为高校面对类似压力提供了制度与道义的准备方案。

当然，判决的意义不止于支持哈佛，更在于重申美国高教系统赖以生存的制度底线，即大学必须拥有自主判断政治与学术边界的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世纪对峙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

这场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与保守主义复兴之间的冲突。是时，自由派推动的民权运动、反战思潮与女性主义等激进议题，使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文化裂变。同时，保守力量也开始反击，将“回归传统价值”塑造为政治口号，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对峙。

在此语境下，“反觉醒”浪潮应运而生。2020年5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捕后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引发了全美大规模抗议。此后，美国高校纷纷加强DEI措施，但这些举措却成为保守派眼中“逆向歧视”“思想灌输”的象征。

在这场围绕资金、治理与意识形态展开的文化战争中，美国高教界显然意识到，它们若不形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不仅将失去财政支持，更将丧失独立性与公共信誉。

司法审判：地方法院的关键判决

在哈佛大学与联邦政府对抗的同时，一场司法审判悄然展开。

5月22日，失去招收国际生资质的哈佛迅速向法院提起诉讼，表示政府试图抹去哈佛1/4的学生群体，即对大学及其使命有重大贡献的国际学生。哈佛校长加伯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项撤销措施是政府一连串报复哈佛的行动之一，因为我们拒绝放弃学术自主，亦拒绝接受联邦政府对我们课程、教职员及学生的非法控制。”

一天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法院法官巴罗斯裁定，联邦政府不得执行其一天前发布的命令。巴罗斯批准了一项临时限制令，裁定如果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命令生效，哈佛将遭受“立即且无法弥补的损害”。

此次判决呈现的宪政逻辑，正是在当下文化战争语境下，为美国大学自治划定的一道制度红线。它不仅回应了哈佛的法理主张，也象征性地为其他高校提供了防御性先例。尽管该案很有可能被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但地方法院的初步判决已然发挥了重要的“司法护栏”功能，即在政权更替与学术分裂的风暴中，维系学术共同体最后的制度性安全区。

当然，判决的意义不止于支持哈佛，更在于重申美国高教系统赖以生存的制度底线，即大学必须拥有自主判断政治与学术边界的

相比捐赠基础设施、捐赠奖学金等项目，捐赠讲席更靠近学术中心，将捐赠者与顶尖科学家、优秀学者联系起来，使其共同见证科学进步，更能吸引捐赠者作出捐赠承诺。由于捐赠讲席的起捐额较高，美国大学基本上至少200万美元起步，属于大额捐赠，通过基金运作可发挥规模效应，使大学有实力进入高收益的投资领域，持续获得资金收益，保障讲席长期发展。

在我国，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组带来了海外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先进理念、新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的新教材，成为前沿学科领域内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同时，捐赠讲席嵌入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机制中，不断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与保障。

总之，加快建设捐赠讲席能够为大学延揽世界顶尖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有力支撑，是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面向教育强国建设，面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我国大学应积极调动社会资源，汇聚多方力量，进一步推动捐赠讲席建设，提升大学的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助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见习副教授)

权力。这场审判不仅是一起技术层面的行政法判例，更是一次象征性的制度正名。它向所有观察者传递出明确信号——哪怕文化战已烧至象牙塔深处，宪政法律仍是高校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后屏障。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世纪对峙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

这场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与保守主义复兴之间的冲突。是时，自由派推动的民权运动、反战思潮与女性主义等激进议题，使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文化裂变。同时，保守力量也开始反击，将“回归传统价值”塑造为政治口号，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对峙。

在此语境下，“反觉醒”浪潮应运而生。2020年5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捕后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引发了全美大规模抗议。此后，美国高校纷纷加强DEI措施，但这些举措却成为保守派眼中“逆向歧视”“思想灌输”的象征。

在这场围绕资金、治理与意识形态展开的文化战争中，美国高教界显然意识到，它们若不形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不仅将失去财政支持，更将丧失独立性与公共信誉。

中国大学评论



包万平

不久前，在参加一场科技年度论坛时，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梁文峰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DeepSeek吗？

在笔者看来，王校长问题的核心并非这些人适不适合、该不该读博士的问题，而是拔尖创新人才应有不同赛道。

从人才培养角度看，拔尖创新人才可以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两种。梁文峰、王兴兴、汪滔等公司创始人和领导者无疑属于实践型人才，更适合在实践领域进行创造性工作。而目前在读的很多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们则属于理论型人才，更适合理论创新和创造，他们的贡献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同样重要。

那么，梁文峰等适不适合、该不该读博？

在笔者看来，那些对学术抱有浓厚兴趣、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且抗压、自律的人是适合读博的，因为博士阶段的学习是对学术产生兴趣，然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强调独立性和创新性。换言之，博士阶段要培养创新、批判性思维，接受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并对学术界或行业有实质性贡献，对博士要问的是“什么是你的贡献”。无法达到以上要求的人是不适合读博，也不该读博的。

在演讲中，王校长提出“真正的实践环境当中，学历不等于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在实战状态下磨炼出来的”，这点出了博士生培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短板问题。对此，我国相关部门也很早就意识到，并在近些年开始深入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分类发展，大力拓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目前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分为两类，即学术型博士和专业型博士。一般情况下，学术型博士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以培养学术研究人员为目标，侧重理论研究与科研能力，解决的是人类知识边界的前沿问题；专业型博士则主要面向有在职工作经验的人群，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培养过程侧重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课程设置与职业需求紧密结合。

回到王校长的问题“如果梁文峰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DeepSeek吗”，答案是大概率不会有DeepSeek。这当前我国博士教育的特点所决定的，如果梁文峰等在大学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么主要是攻读学术型博士，这个赛道决定了他的出路和DeepSeek的产生是有差别的。相反，目前梁文峰等通过在实践中历练的多年探索，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储备，此时他们进入大学继续攻读专业学位博士，则能很好地解决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突破问题。这不管是对企业发展还是对技术产品都是有好处的。

进一步追问，如果梁文峰继续读博士，如何让他们在博士生培养环境中仍能产生DeepSeek？在笔者看来，要实现这一点，目前的高校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变革。

一是建立科学的选拔机制。选拔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前提，以往我国博士生的选拔均采用考试的形式，虽然近些年“申请-审核”制的比例在提升，但是传统的选拔路径依然占主导地位，这样选拔出的博士生大多智力出众，但在实践创新方面有一定欠缺。面向未来，高校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应兼顾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注重考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同时采用灵活多样的测试方式考查学生，发现更多有创新潜质的“偏才”“怪才”“奇才”。

二是完善动态评价机制。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点，需要进行长周期的跟踪与动态评测。大学可以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博士生培养不同阶段的考查力度，特别是考查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潜力。针对在评价中学生出现的问题，大学需要探索“一人一策”精准化培养方案，重视对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是强化实践场景训练。大学可依托科研基地、产业平台等，将优质科研资源融入对博士生的培养中。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等，让博士生参与到帮助企业破解科技难题、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等工作中。在此过程中，实践场域获得知识成果、精神价值、人力资源和社会效益。大学可以获得部分科研资金、检验和应用科研成果的渠道，同时也培养了拔尖创新人才，可谓一举多得。

四是推动跨学科融合。目前博士生培养的方向划分过于细致和狭窄，需要在博士生培养中孵化出DeepSeek、宇树科技等，需要多学科集成。未来博士生的培养要打破学科壁垒、院系界限，实施多学科联合、合作培养复合与交叉型创新人才，通过学科交叉，实现学科门类间的知识融合，达到拓宽学生专业视野、强化专业综合素质、提升创新能力目的。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见习副教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不同的赛道